

周末
Weekend

思语

青纱帐里的号角

□ 郭华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区的青纱帐是八路军、游击队打击敌人的天然屏障，党的报纸发出的声音就像青纱帐里吹响的号角，让广大抗日军民听到了党的声音。

冀中平原的青纱帐苍苍茫茫，绵延千里。每当有风吹来，其势若碧波的大海，波涛起伏。

青纱帐记载着农民的辛劳，也寄托着农民的希望，青纱帐里演绎着一代又一代悲欢离合的故事，青纱帐更是战争年代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的天然屏障。

可是，你见过在青纱帐里办报纸吗？走进河北省饶阳县《冀中导报》纪念馆，一幅在青纱帐里印刷报纸的照片，让我驻足良久。

日军占领华北之后，冀中地区笼罩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下，人们获得可靠消息的渠道很少。本来社会秩序就已动荡不安，再加上种种谣言传播，更是人心惶惶。1938年夏天，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提出创办党委机关报。经过紧张筹备，9月10日报社在任邱县陈王庄创刊，名为《导报》。1939年2月份，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指导冀中区精简机关，以应对更加严峻的形势，《导报》暂时停刊。随后，冀中军区八路军120师并肩作战，连续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此情况下，《导报》于1939年12月份在武强县北代村复刊，并更名为《冀中导报》。

《冀中导报》及时刊出我党的抗日主张，我党我军在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遏制了谣言的散布，极大地鼓舞了冀中人民的抗日斗志，促进了冀中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大力宣传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特别是坚持平原反“扫荡”的顽强斗志和灵活机动的对敌斗争经验。

1942年8月份，鉴于“五一一大扫荡”之后的严峻形势，《冀中导报》再次停刊，报社人员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分区，创办分区的报纸，代替《冀中导报》继续发声。那是冀中地区抗日斗争最残酷的时期，我们报纸发出的声音就像青纱帐里吹响的号角，响彻冀中平原，让广大抗日军民听到了党的声音。人们得到报纸后，你看了我看，一张张印的八开小报，不知被多少人传看多少次。

报纸的导向作用被发挥到极致，《冀中导报》被誉为“冀中人民的向导”。然而，为了办好报纸，报社工作人员的付出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在青纱帐里办报不算什么，最困难的是在地道中办报。地道中阴暗潮湿又缺乏氧气，有时候连煤油灯都点不着，他们却长期在地道中坚持工作，更严峻的考验是随时都可能献出生命。《冀中导报》总编辑沈蔚是江苏人，1939年从延安参加八路军前线记者团来到冀中，后来在安国县西张庄突围时牺牲，年仅25岁；《冀中导报》记者、“五一一大扫荡”之后任九分区《团结报》社长的周景陵，1943年7月份，在饶阳县雅城村与敌人遭遇，英勇牺牲，年仅27岁……

《冀中导报》的队伍是一个年轻的集体，社长范瑾20岁，朱子强担任总编辑的时候19岁，工作人员中年龄大的也不过30岁。就是这样一群年轻的新闻战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用报纸传递着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5年6月份，《冀中导报》在饶阳县长流庄再次复刊。1949年1月1日根据毛泽东题写的新报头改为《河北日报》出版，并于当年2月份搬入保定。

从1938年到1949年的11个年头里，《冀中导报》一直在农村，其中在饶阳县的时间最长。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套分散隐蔽、机动灵活的办报模式，主要依靠根据地的“堡垒户”，这些“堡垒户”冒着生命危险为报社提供安全的住所和办报环境。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人民群众倾其所有滋养了我们的报纸。

这些年，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独树一帜的《冀中导报》纪念馆以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一处处复原的场景，让观众清晰地看到我们党的报纸从哪儿走来，看到党报的初心。

走出纪念馆，我依然回味着那张在青纱帐里印刷报纸的照片。如果说《冀中导报》是青纱帐里的号角，人民群众就是掩护我们的青纱帐。

责任编辑 刘佳 许跃芝
郎冰 刘蓉
视觉统筹 高妍
联系邮箱 jjrbzm@163.com

敦煌向世界讲述千年故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梅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绵延千里的河西走廊被唤醒。

“一世风沙，一眼繁华，一段历经磨难后的壁画，一段被开启后的永恒……”久远沉寂而又绝世精美的莫高窟遗世独立于大漠，风沙不掩其姿，流年不毁其骨，一如当年。

黄沙绵延，敦煌不朽。通过多年持续不断地保护、研究、弘扬，莫高窟“活”了起来，久远的故事和“莫高精神”在流传……

在保护修复中绽放光彩

或是佛陀居中讲法，罗汉环伺听经；或是曼妙飘带萦绕于身的飞天眼波流转……提起敦煌莫高窟，许多人眼前就会浮现这样的壁画。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大漠戈壁深处，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敦煌文化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

莫高窟历代营建的735个洞窟，分布在15米至30米高的断崖上，上下分布4层不等，保存着各个朝代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其中彩塑2400多身，壁画4.5万多平方米，唐宋时代木构窟檐5座，还有民国初重修的九层楼。“如果按1米高的画廊排列，要排45公里。”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如是说。

伫立洞窟口，似乎能看到夜色深沉中，莫高窟工人在如豆灯光下石壁作画的情景。“保护、研究、弘扬，这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赵声良说，没有保护的研究是空谈，在保护好基础上，深入研究莫高窟历史、艺术价值，随之弘扬，让其对当前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是研究院的工作职责。

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莫高窟结束了近500年无人管理的状况，到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至今，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汇聚敦煌、扎根大漠、薪火相传，让莫高窟这颗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重放光彩。

岁月变迁，敦煌莫高窟保护的脚步从未停歇。2019年，敦煌研究院不断突出科技应用，夯实保护基础，完成了6处石窟14项文物保护工程

和开放洞窟的日常维护年度任务，修复各类病害壁画718平方米、塑像18身；初步建成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完善了基于监测数据的分析处理和风险评估机制。

“敦煌石窟的保护已经由过去抢救性保护发展到今天的预防性保护。”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说，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大力推进科学保护工作，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了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

在数字应用中变得鲜活

“传说古印度有位仁医叫流水。一日，流水医生和他的两个儿子下乡出诊……”也许，这世上最高贵的艺术正是对生命的敬畏。”这是由敦煌莫高窟第55窟《流水长者子》的壁画故事制作而成的动画《仁医救鱼》片段。

4月13日起，在微信小程序上，“云游敦煌”系列动画剧首播。故事都来源于莫高窟经典壁画，每日更新，每集在5分钟内。穿越千年时光的敦煌壁画通过动画制作，在微信小程序上“活”了起来。观众不仅可以在每部动画剧中，找到相应的敦煌壁画和故事，还能亲自参与到故事的演绎中，配音后分享给其他人。

这些数字化应用推广基于敦煌数字化保护工程实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就先后承担完成了多项有关敦煌壁画数字化技术研究和攻关项目，为今天莫高窟全面数字化技术应用奠定了基础。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俞天秀是“80后”，在莫高窟工作了15年，主要负责采集洞窟、壁画、彩塑及相关文物影像，加工成数字图像，拼接汇集成电子档案，构建多元、智能的石窟文物数字资源库。莫高窟因疫情闭馆期间，俞天秀和同事们抓紧时间采集了148窟的影像，148窟是开放的大型洞窟，共采集取相2万多张。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敦煌石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观众进入“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点开页面后，可以采用VR360度全景漫游方式来参观、欣赏石窟之美，从而实现身临其境般参观敦煌石窟。同年6月份，英文版上线，访问量已经超过700万次。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图像采集洞窟230余个、图像加工洞窟145个、虚拟漫游洞窟160个、雕塑三维重建40余身、底片数字化近5万张、大遗址三维重建3处、74项著作。“敦煌数字化成果已广泛应用于考古、美术临摹、保护修复、旅游开放等领域，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俞天秀说，数字化保护工程不仅仅是留存档案，它会服务于各个领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继续扩大数字化成果的应用领域。

“文物数字化工作是今天文物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手段，我们会进一步加强数字敦煌项目的持续建设，并汇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成果，形成完整有序并能永久保存、永续利



用的丝绸之路数字文化遗产，为助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丰富的数字文化资源。”赵声良说。

在交流对话中弘扬文化

拂去岁月的风尘，一切的付出皆因坚守而变得更厚重。

“敦煌莫高窟，世界上最大的石窟，柬埔寨吴哥窟，世界上最大的寺庙……今天，当它们伸开巨掌携手相握时，一场远隔万里，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随之展开。”2019年8月31日，由敦煌研究院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中心首映。这部以亚洲文明对话为题材的纪录片，让“两窟”实现了一次超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展现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文化底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

“我们想通过莫高窟与柬埔寨吴哥窟两处文化遗产对话的形式，探寻两国文明历史上的互鉴交流。”赵声良说。

敦煌文化是开放、包容的。近年来，敦煌研究院针对不同公众的需求，先后在美、英、法、德等18个国家（地区）和国内20多个省市举办了80多场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敦煌艺术展览；举办文化遗产进校园“六进活动”“敦煌文化艺术研学游”等公益活动，获得了高度评价，成为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名片和品牌。

让世界认识敦煌，让敦煌走向世界，这是几代人孜孜不倦的追求。

时至今日，已88岁高龄的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前副所长李青鹤，仍然在被称为莫高窟“姊妹窟”的榆林窟修复佛像、壁画。

1956年，他来到敦煌莫高窟从事文物修复工作，一修就是一辈子。他参与修复壁画近4000平方米，修复彩塑500余身，被评为2018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儿子、孙女也都投身于敦煌研究院文物修复、艺术设计工作。

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坚定前行？这些投身戈壁的莫高窟人异口同声给出的答案是：莫高精神！70多年来，一代代莫高窟人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以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为己任，喝着宕泉的咸水，与风沙相伴，排除一切艰难困苦，不断开拓着敦煌的崭新局面。

“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这是我们的时代使命！”赵声良说，让更多的人感受敦煌魅力，让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让更多的人从中汲取所需养分，是新一代莫高窟人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